

19.17

高要文史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高要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高 要 文 史 资 料

第 七 辑

政协高要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十月

高 要 文 史

（第七辑）

政协高要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印数 1——3000册（赠阅）

肇庆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1年10月

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

91粤印准字第115号

EA26/28

政协高要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黄道庄

副 主 任：梁毅生

委 员：李广佳 谢启森 陈鸣銮

顾 问：陈大同 罗维炽

目 录

我在省港大罢工和“四·一五”政变期间的一段经历		邓兆兰 (1)
邓兆祥与“重庆号”起义的前前后后		高要政协文史办公室 (7)
抗战前夕我党在肇庆学校的一些活动情况		梁奇达 (12)
高要二区武工组活动片断		黎 斌 (15)
记爱国民主人士黄若天先生		<u>吕志澄</u> 梁敬仪 (18)
黄若天同志悼词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20)
自学一生能译十四种外文的何国良		高要政协文史办公室 (23)
一代名医张允文二三事		<u>张宗远</u> (29)
甲寅乙卯水灾记		李廷芳 李志鸿 (31)
高要解放前后的洪涝旱灾		张盛炜 (36)
解放后丰乐围抗洪抢险记		黄 敏 (43)
我目睹日军炮轰高熊村的情景		陈瑞彭 (46)
日寇侵扰大湾的回忆		罗维炽 (49)
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到高要视察的二三事		方镜波 (53)

高要红巾军反清斗争片断·····	叶信良 (56)
广州农讲所的高要学员·····	李广佳 (60)
高要侨史纪略·····	谢启森 (62)
西江流域最大的屈肢墓葬群·····	陈小鸿 梁思聪 (66)
金利圩镇的由来与发展·····	周孟飞 (69)

“高要县农村文艺宣传队”队史·····	梁宝光 (72)
高要水产概貌·····	邓茂华 (76)
新桥洋监·····	钟仕周 (80)

三、四十年代肇庆镇的饮食业

·····	高要政协文史办公室 (82)
高要特产白土花生·····	黎耀忠 曾庆雄 (84)

封面题字·····	陈景舒
封面设计·····	何冠群 刘巧容

我在省港大罢工和

“4·15”政变期间的一段经历

邓兆兰

我是广东省高要县肇庆镇人。1925年初，我在香港华仁书院读书。香港是英殖民地，奴化教育和封建思想教育禁锢着学生的精神和身体，学校里死气沉沉。香港《中国新闻》社社长陈秋霖先生组织了一个进步青年团体——香港青年社，宗旨是动员爱国的香港青年学生参加国民革命。社员有100多人，多是皇仁、圣保罗、华仁、汉文师范、育才等中学的进步学生。香港青年社负责人之一的彭粤生是我的好朋友，他经常带我参加该社的活动。1923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华仁书院和香港青年社社员发起了追悼孙中山的大会，并在会上号召同学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关心国家命运。陈秋霖还召集各校的进步师生座谈。

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香港学生对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十分愤慨，香港青年社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通电援助上海被惨杀同胞，并酝酿罢课。6月初，中共广东区委派杨殷、邓中夏、杨匏安到香港发动工人罢工。香港青年社发动各校学生罢课。有一天，青年社召集学生代表在香港“利希臣”花园开会。我校一名姓马的青年社社员参加这个会后向我们传达了会议的精神；香港学生罢

课回穗的，可以进入广东大学继续读书，保证安排住宿。随后，皇仁、圣保罗、华仁、西营盘、气华、育才、湾仔等学校的学生代表发起成立了香港学生联合会，号召各校学生罢课，参加到省港大罢工的行列中。我和华仁书院的10多个同学怀着一腔热血，参加了罢课，拿着海员工会发给的免费乘船票，于6月中旬回到广州。

6月底，从香港返广州参加省港大罢工的学生有200多人，被安排在广东大学的学生宿舍里住宿，每天凭省港罢工委员会发给的饭票在罢工工人食堂吃饭。香港青年社也迁回广州，在越秀南路一间小学内办公，仍由已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陈秋霖担任社长，但实际上由彭粤生、莫沧白等人负责具体工作。我由彭粤生介绍参加了香港青年社和新生学社。8月中旬，从香港回穗的学生在广东大学召开全体大会，由彭粤生、詹展育等主持。会上决定改组香港学生联合会，成立香港学生联合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选出莫沧白、詹展育、黄剑英、冯雄磋、周延庆、李伟才、杨锦钊、郑金福、黎明心（黎子云）、陈吉云、邓兆兰共11人为执行委员。香港学生联合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成立后，成为领导香港学生参加广州革命群众运动的中心。“学联会”出版了《香港学生》，经常发表声援罢工的檄文，推荐罢课学生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作，组织香港学生参加反帝示威游行和集会。同年8月25日，廖仲恺先生和陈秋霖先生被国民党右派暗杀于惠州会馆中央党部，“学联会”组织我们参加了追悼会。我们对陈秋霖先生的被害感到十分悲痛，他是香港青年社的创始人，是我们参加进步活动的引路人。我们表示不忘陈先生的遗教，为罢工贡献力量。当时，共青团广州地委正在领导反基督教运动，“学联会”也成立了香港学生反基督大同

盟。有一次，香港学生包围了石室，阻止圣心教会学校的学生上课。在广东党、团组织的教导下，从香港回穗的学生大多参加了共青团和新学生社。1925年底，黎子云介绍我参加了共青团。入团后，我被编入“学联会”的团支部。团支部共有莫沧白、黎子云等七、八名团员，由詹展育担任团支部书记。团支部经常开会，学习广东党、团的文件，讨论研究“学联会”的有关工作。

自从我回广州后，就被保送到广东大学预科读书。但实际上，我多数时间都在“学联会”参加各项活动，很少到校上课。广东大学里左、右派学生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学生中经常因政治见解不同而发生打架、争吵等事件。1925年12月的一天，广东大学法学院的国民党区分部开会选举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负责主持大会的共青团员黄光明估计右派学生会在大会上闹事，便到省港罢工委员会请陈均平等三名纠察队前来维持大会秩序。选举大会开始后不久，“士的党”骨干何觉甫等果然挑衅闹事，双方发生激烈的争吵。陈均平等出来制止，但右派学生大声喝打，将陈抓了起来。不一会，我看见罢工纠察队训育处主任彭粤生带领几十名纠察队员包围了会场，将陈均平抢回，并捉了几名闹事的右派学生。这件事情发生后，“士的党”分子乘机造谣，诬蔑工人纠察队捣乱大学，殴打学生。这件事惊动了广东大学校长陈公博和省港委员会顾问邓中夏。邓中夏亲自调查此事，并和陈公博等人协商解决。邓中夏认为工人纠察队帮助左派学生与“士的党”分子斗争是应该的，但彭粤生等擅自行动，闯入广东大学捉人，给“士的党”以造谣污蔑的借口，造成了较坏的社会影响，彭粤生等人的行为是错误的。于是，邓中夏决定给彭粤生记过的处分，开除了黄光明的学

籍，并将事实真相向社会各界披露，呼吁加强工学团结，警惕右派分子破坏罢工的阴谋。由于邓中夏的正确处理，轰动一时的广东大学法科纠纷案件很快就平息下来。彭粤生也表示要接受教训，在与右派分子作斗争时要注意策略，讲究方法。

1926年初，彭粤生代表组织找我谈话，提出要调我到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训育处工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锻炼自己的好机会，便离开广东大学到省港罢工委员会报到。训育处是负责工人纠察队政治、文化教育的专门机构，该处共有训育员20多人，其中有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毕业生马振育、郭明生及和我一起从香港回来的学生陈吉云等。工人纠察队总部设训育处，由彭粤生任主任。大队设训育主任，中队设训育员。我先后在几个中队担任训育员，曾在中山石岐和广州的沙面、凤凰岗等地驻扎过。我辅导纠察队员学习革命理论和文化知识，每天给他们读报、讲时事、教唱歌。我的团组织关系被转到纠察队。彭粤生经常召集训育处的党、团员开会，传达上级的指示，布置开展训育工作。

1926年10月，我党为了集中力量支援北伐战争，决定结束省港大罢工和停止封锁香港，工人纠察队改编为财政部缉私卫商保卫团。彭粤生通知我回广东大学（当时已改名中山大学）继续读书。同年12月，中大党组织又决定送我到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开办的华侨运动讲习所学习。同我一起去的还有从香港回来的学生黎子云、李伟才、黎纯之等3名团员。华侨运动讲习所由海外部部长彭泽民兼任所长。任教的有郭沫若、恽代英、熊锐、肖楚女、任卓宣、韩麟符等著名共产党人和邓演达、甘乃光等人。学员有70多人，其中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华侨运动讲习所设在大东门的国民党中

央党部（今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宗旨是培训派往海外开展革命活动的干部。讲习所于1927年3月结业，一部分学员即派往东南亚等地工作，其中有黎纯之和李伟才。当时，我因母亲病重而请假回肇庆，故没有被派往海外工作。于是，我后来又回到中山大学读书。

1927年4月12日，上海发生了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大批屠杀共产党人。消息传到广东后，中大的党、团组织根据上级指示，曾布置校内的党、团员提高革命警惕，准备应变。团组织通知我离开学校，到珠江边的小艇内暂避一时，但我没有执行。4月15日凌晨，反动军队包围了中山大学，“士的党”分子分头带领军警到各宿舍捉人。毕磊等几十名同学被捕，我也在内。我被关押在南关戏院、车歪炮台等处，后又被押到市公安局提审。敌法官拿着从团广东区委搜出的团员名册问我：“你是不是C·Y分子？”我坚决不承认。敌法官又说：“这名册是清党委员会送来的，证据确凿，你不用低赖了。”经过几次审问后，敌人将我押到公安局附近的明星戏院等候判决。戏院里关押了很多入，我们一排排坐在看电影的椅子上，周围有荷枪实弹的军警看守。有一天，我看见省农民协会西江办事处主任韦启瑞被敌人押了进来。以前，彭粤生曾介绍我与韦启瑞相识。我找了一个机会向韦启瑞打听一个在西江办事处工作的香港同学（姓何的。名字忘记了）的下落。韦启瑞说：“他在敌人搜查时逃脱了。”几天后，我看见韦启瑞被敌人押出去，听说是牺牲了。当时，我的哥哥邓兆祥在广东海军任下级军官，他托同学陈策在市公安局里为我疏通。于是，敌法官判决我五年有期徒刑，送到南石头惩戒场监狱囚禁。

同年5月，我被押解到南石头，在狱中见到了彭粤生。

他是被香港学生冯金高出卖而被捕的。他态度十分坚决，十分关心我们几个被捕的香港学生，教育我们要站稳革命立场，经得起各种考验。同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了。我们在狱中听到了珠江北岸的枪炮声，看到了看守的神色惊慌。狱中党组织试图组织越狱，但是，起义很快失败了。敌人加强了对监狱的警戒，并一批批地枪杀难友。有一天，彭粤生被看守叫到监狱操场上照相，他回来后便将李纯初、郭明生和我几个香港学生叫到身边，勉励我们不要灰心，决不能向敌人低头。几天后，彭粤生、郭明生等10多人被敌人押往监狱操场上枪毙了。彭粤生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对同志热情诚恳的高大形象永远留在我心中。

1932年，我刑满后释放。出狱后，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根本找不到党组织。后来，我回到家乡高要县肇庆镇当中学教师，从此，我便与党失去了联系。

（卜穗文记录整理）

邓兆祥与“重庆号”起义的前前后后

高要政协文史办公室

编者：关于原国民党巡洋舰“重庆号”的起义和舰长邓兆祥的事迹，《高要文史》第六辑已发表了邓兆兰和何求两先生的撰文。现根据当年“重庆号”的高炮指挥仪军士，现住海军广州舰艇学院的许家恺（高要县人）教授的口述，再把邓兆祥与“重庆号”起义的前前后后整理成文，供研究参考。

我是“重庆号”巡洋舰的高炮指挥仪军士，军舰起义时，我在舰上服役。现回忆“重庆号”及邓兆祥舰长毅然率舰起义的情况，简叙如下：

去英国学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英国拥有较多的战舰，但兵源不足，所以，他们以赠送军舰为由，在中国招收军人到英国学习海军，并接收“重庆”、“灵甫”等舰艇。还确定这些舰艇须先在英国皇家海军舰队服役，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官兵们方可驾舰回国。于是，当时政府决定于一九四四年初在重庆各大、中学校中招收赴英接舰参战的青年学生，同年底在重庆集中，准备集训后赴英国。由于一九四五年八

月十五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将告结束，英国人变了挂。觉得没有必要再训练中国海军，原协定赠给中国的八艘舰艇也出尔反尔地告吹了。然而，赠送舰艇给中国的事，全世界都是知道的。经中英双方谈判，英国才无可奈何地只答应把巡洋舰“重庆号”送给中国，而另一艘名为“灵甫号”的护卫舰只作借给中国使用，也同意中国派出官兵到英国学习。因此，官兵分数批赴英。第一批于一九四五年底由重庆经印度赴英，第二批于一九四六年中从上海乘英舰至香港转乘英航空母舰赴英，第三批由上海直赴英国。

邓兆祥曾到德国学习鱼雷快艇，并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四年被派去英国深造，回国后任南京鱼雷营营长，率领布雷队先后在长江、西江布设水雷，阻击向上游进犯的日军。他为人正直、热情、爱国，也没有什么派系作后台，因而老被排斥，不受重用。日军投降后，也不安排他去英国学习，而派他东下去接收日军的“长治号”军舰（该舰起义后改为“南昌号”）。但英国人对邓兆祥的才华非常赞赏。英国人认为邓兆祥是中国的一名航海家，只有他才能负此重任。当时中国也同意派他去。于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邓兆祥率领第三批中国海军数百人乘坐澳大利亚“皇后号”去英国学习。

接收“重庆号”

我们到了英国后，即分开接受英国海军的训练，到一九四七年八月，我们登上“重庆号”开始检修试航。一九四八年五月，基本试航完毕，并把英国国旗降下，换升中国国

旗，中国海军正式接收“重庆号”，任命邓兆祥为“重庆号”舰长，晋升为海军上校。经过几天的准备，备好一切给养，即启航回国。我们从英国朴次茅斯军港出发经西班牙、马尔他、埃及、南也门、斯里兰卡（原锡兰）、新加坡、香港、进入国门，再经上海，直达南京。舰到新加坡时，我们即电告香港，预报到达时间。偏巧这时台风骤起，天气险恶。人们都说，这样的天气是不能出海的。但通晓天文气象和富有航海经验的邓舰长却说，我们既去电香港，就要恪守时间，坚定信念。他凭着自己多年的航海经验，巧妙地跟着台风尾航行，化险为夷，使舰艇顺利地按时抵达香港。

“重庆号”起义

我们于一九四八年八月抵达南京，后从南京转至上海。但当时上海外滩只许英、美的舰艇停泊而不准许“重庆舰”停靠，我们只好临时停泊在江南造船厂的江面上。不久便调到葫芦岛基地，参与塔山战役。同年十二月，“重庆号”又奉命开去山东青岛。但青岛受美国控制，不让进港，只好折回上海。

这时，舰艇上的官兵思想比较混乱，也比较模糊。在英国时，英国共产党曾问我们是国民党的海军还是毛泽东的海军，并说毛泽东海军好。但到了香港，连毛泽东著的《论联合政府》一书也不准我们看。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二年，共产党已解放了东北，继续向华东、华中推进。当时上海市很乱，人心浮动，物价上涨，货币贬值。我们从英国带回的几百英磅，换了金元券后，几个月后就只够买两碗白面条吃。每天都有很多士兵开小差。但舰上进步官兵也不少，有

的还是地下共产党员（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如毕重远和轮机军士张启钰等。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舰艇上的官兵都不愿再与共产党打仗，希望投奔解放区。但情况仍然很复杂：

（1）组织者都是单线联系的，虽先后接上了头，但在白色恐怖的统治下，不得不小心谨慎，动员工作很难开展；（2）“黄安号”已在山东起义，国民党担心长江上的舰艇也会出问题，因而把“重庆号”调进吴淞口基地，给起义造成困难；（3）国民党海军总部为了防止反叛，增派委员到各舰艇严密控制，当时“重庆号”也增派了舰长。对新舰长的底我们摸不透，而邓舰长也觉得自己的处境不佳，希望不再当舰长而解甲归田。王颐楨（起义的组织者之一）觉得起义时机已成熟，遂对进步爱国官兵再作串连发动并研究了周密的计划，确定于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实为二十五日凌晨）举行起义。起义那天，新舰长不肯开船。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邓兆祥舰长挺身而出，毅然下令：开船！随即走上舰梯，稳驾“重庆号”冲出长江口，直向山东烟台驶去。

国民党发现“重庆号”已驶离吴淞口，即多次派出飞机进行侦察。最后终于发现“重庆号”起义投奔共产党，抛锚停泊在解放区烟台港。第二天国民党便出动大批轰炸机飞到我们上空。我们还很天真，用无线电同他们联系，叫他们不要炸自己的同胞。他们哪里肯听，一股劲地向着战艇扔炸弹。隆隆的爆炸声震耳欲聋，舰艇周围的海面也被炸起一条条冲天的水柱。为了避免重大损失，我们本想把舰艇开进旅顺口暂避，但苏联驻军要我们全部卸下武器装备才准进港。最后，由邓舰长建议，党中央批准，同意“重庆号”开往葫芦岛基地。就在这时，邓兆祥舰长重返“重庆号”（到烟台时，邓舰长离开了战舰），受到官兵们的热烈欢迎。当晚邓

舰长即掌舵开航，待飞机再来时已找不到我们的踪影了。

“重庆号”沉没与打捞

国民党一直没有放弃对我们的搜索。到了二月中旬，我们终于又被发现了，并受到大批飞机的轰炸。经过几天的周旋，我们也有了经验，以牙还牙，针锋相对，只要飞机飞近我舰时，全舰高射炮立即齐火射击，使飞机无法低飞，被迫飞向高空，扔下大量炸弹，悻悻而去。然而，我们的弹药有限，不几天，炮弹打光了。怎么办？当时党中央指示我们，船可弃，人不可损，有了人，还可以建设我们的海军，人是第一重要的。于是，我们决定，白天离舰，避免伤人，晚上回舰，把主要部件、精密仪器设备卸下来。经过几天的白天走，晚上拆，能拆的都基本拆了下来，不能拆的则涂上厚厚一层保护油，并于三月二十日打开舰艇船底海水门，“重庆号”慢慢沉下了海底。

一九四九年底，党中央决定要打捞重庆舰。一九五〇年原“重庆号”部分官兵（约二百多人）开赴葫芦岛进行打捞，当时打捞的部队代号叫“黄河”部队。总部设在大连葵英街。“黄河”部队的首长正是邓兆祥，政委是朱军（现已离休，原是南京海军指挥学院的院长）。

经过官兵一年的努力，这艘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重庆号”巡洋舰终于被打捞起来了。

（根据许家恺口述资料整理）